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
丛书主编 彭一刚 郑时龄

The City Is The People

Henry S. Churchill

城市即人民

[美] 亨利·丘吉尔 著

吴家琦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
丛书主编 彭一刚 郑时龄

The City Is The People

Henry S. Churchill

城市即人民

[美] 亨利·丘吉尔 著

吴家琦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即人民 / [美] 丘吉尔 著; 吴家琦 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7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

ISBN 978-7-5680-0758-0

I. ① 城… II. ① 丘… ② 吴… III. ① 城市规划—经验—美国 IV. ① TU984.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4345 号

Copyright ©1945, 1962 by Henry S. Churchill, first published in the Norton Library 1962, by arrangement with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Co., Lt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通过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授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7-2015-261号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

城市即人民

CHENGSHI JI RENMIN

[美] 亨利·丘吉尔 著 吴家琦 译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地 址: 武汉市珞喻路1037号 (邮编: 430074)

出 版 人: 阮海洪

丛书策划: 姜新祺

丛书统筹: 刘锦东

策划编辑: 张淑梅

责任编辑: 王丽丽

版式设计: 赵 娜

责任监印: 秦 英

印 刷: 深圳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96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238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投稿邮箱: zhangsm@hustp.com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编委会

主 编：彭一刚 郑时龄

编 委：段 进 华 晨 黄亚平 李保峰

李振宇 刘克成 毛其智 宋 昆

孙一民 张京祥 张 明 赵万民

（以姓氏拼音为序）

作者简介 | About the Author

亨利·丘吉尔 (Henry S. Churchill)

亨利·丘吉尔是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美国规划师协会会员，出生于芝加哥，曾在康乃尔大学攻读建筑学。后移居纽约，在此他将建筑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是城市规划领域主要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之一，并主持开发了诸多大规模住宅项目。他曾与重新安置管理署在绿带城市开发建设方面有过合作，后又担任美国公共住房管理署的顾问。1952年，他把自己的事务所迁到了费城，并开始着手准备伊斯特维克的旧城改造工程。曾在许多专业期刊上发表过大量建筑与城市规划方面的文章。

序 言 | Preface

《城市即人民》原著出版于二战后 50 年代中期，我印象中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伊始，梁思成委托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代订的书目中即有该书。值得注意的是，书成 15 年后，作者基于瑞典、荷兰等欧洲国家及美国的经验增写了**前言**和**结语**，重申“**城市属于它的人民**”这一基本思想，实属点睛之笔。重阅该书结语最后一节所述：

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说，城市规划有一个重要的衍生品，它可以，实际上非常有可能，带给人们一种充满美感的环境。随着我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不断增强，对休闲享受的追求也越来越高，愉悦感已经成为生活中一份宝贵的财富。……

回顾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联合国高峰会议后，国际城市规划学术思想不断发展，包括我国人居科学的今天，前述思想的重申可谓已起到启蒙作用。这足以说明，对二战后早期经典文库的译介，有助于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与提高。

吳良鏞

谨以此书献给亨利·赖特



托莱多的景象

前言 | Introduction

自我写完这书至今已逾十五年了。当看到这本书的重印本时，我感到非常欣慰。我有好多年没有翻阅它了。当再次阅读它的时候，我发现，即便不能用充满智慧之类的字眼来形容它，至少可以说其中的见解是非常坚实有力的。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一直忙碌于城市规划的实际工作，有时我的角色是政府部门的官员，有时是“规划设计顾问”，也有时是评审。对于我在1945年时说过的许多东西，我现在的看法改变了很多。至于我的这些修正到底会置我于哪一类，是老朽的保守派，抑或是激进的反对派，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其实这也没什么，我认为真正要紧的是，和我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以及比我年轻一些的大多数人，他们仍然坚持着二十多年前的那些理念。

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城市是由人民构成的，对于这个观点我丝毫没有改变过。恰恰相反，今天有一个令我担忧的问题，那就是城市规划的方法和程序已经开始扭曲，从民主的社区组织转变为服务于少数人的权力机关。试图以在官僚机制运作中少出错作为衡量满足民众需要的标准，这一点我绝对不敢苟同。我不是一名乌托邦理想的信徒。

或许我的担心有些夸张。尽管通过立法手段确立的技术官僚机制控制着局面，包括控制城市的实体形态及经济状况，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控制已经被私人开发商和政府官员用巧思妙想联手破坏殆尽^①。政治上的腐败总是容易得到纠正，而自以为是的清廉傲慢却不然。

归根结底，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城市规划就是要重新检验其中一些司空见惯的说法，换句话说，就是要重新检验那些所谓的规划理想和规划目标。在今天现实让这种重新检验变得更加必要。城市蔓延（Urban Sprawl）真的就那么不好吗？对什么人来说不好，又为什么不好？在何种程度上城市实体的衰败是缘于经济的演变呢？反过来说，在何种程度上经济的衰败是缘于城市实体的破败呢？贫民窟不是一种经济现象，而实体的衰败只是经济衰败的一种表象而已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清理贫民窟”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劳民伤财。什么是“城市枯萎”？是什么把人们吸引到这些地方，让人们在其中找到乐趣？显然不是它的“艺术品”和“独特文化”。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如果城市规划师环视一下四周，他会吃惊地发现，他所奉行的一些金科玉律是多么不真实，而许多传统观念又是多么愚蠢。

① 商人靠的是精明钻营，而主管具体工作的政客们则是与金钱利益携手共进。——译者

让人吃惊的是，此类传统规划观念几乎为世人全盘接受，不仅在技术界，而且在行政管理者中间，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连普通百姓也认同这些观念。城市规划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城市里的功能分区（Zoning）几乎是举世遵循的法则；无论“总体规划”（Comprehensive Plan）是什么，只要城市符合这个规划，“总体规划”一词就会让立法机构感到很舒心。五年计划这个概念并不是斯大林的发明，而是那些大公司的保守会计师们的设计。我们也即将有自己的城市事务部（Department of Urban Affairs）。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进步。各种新思想像传统观念一样被接纳，这是接受未来各种思想的前提条件。因此，确保新思想的不断涌现是十分重要的。

新思想都是在对旧有的事实进行全新的观察中产生的。“事实”不仅仅是一堆统计数据，事实是对人们普遍接受的事物的体验。这些数据和体验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进行解读，并被赋予新的含义。但是这种解读与对它们的量化、数据分析无关，这些数据的量化和分析只是作为论证时的支持材料。数字仍然是过去的那些数字，但是它所服务的对象和目的则有所不同。有时只需要简单地把镜子变形，从凹面镜改为凸面镜就可以达到目的，反之亦然。这种做法很可能将镜面毁坏，导致学术丑闻和政治敌意。自然人们很少这样做。

人们很滑稽地把大规模的城市规划方案叫作“城市更新”，或许因为此类城市更新计划缺乏明显的成功案例，反而激发了新思想、新主意。这也促使学术界的一批老人，包括我自己，逐渐退出舞台。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我们看到了新概念出现的迹象，这些新概念不仅体现在城市的实体上，也体现在新的思想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威廉·惠顿（William L. C. Wheaton）、让·戈特曼（Jean Gottmann）、亨利·法金（Henry Fagin）、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维克托·格鲁恩（Victor Gruen）……当然远不止这些人。

对这些人来说，同时对其他人来说，很显然，我们必须面对的绝不是过去的古老城市，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说历史上的城市是向后看的，那么大都市则是在向前看。城市仍然属于它的人民。

亨利·丘吉尔

1962年1月于费城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从前的历史 / 001

第二章 早期的状况 / 019

第三章 方法 / 049

第四章 问题 / 065

第五章 各种努力 / 087

第六章 发展走向 / 109

结 语 / 135

注 释 / 147

图片来源 / 148

《第一章

从前的历史》

在城市生活方式的演变过程中，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代的转折点。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瓦解性的力量、破坏性的力量处于失控状态；但是同时，人们第一次普遍意识到，这些力量可以被转化为服务于社区的一股建设性力量。当我们在寻找全新的社会和经济模式时，我们同时也在寻找一种新的城市环境。

人们没完没了地谈论“城市开发”“总体规划”“阻止城市破败的蔓延”及“城市去中心化的过程”。至于它们的实际操作过程、城市的历史延续性等问题，则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事物改变得越多，就越是保持不变。”迫使改变的力量是毫不留情的，但是人们的愿望则保持不变。新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但新力量的意义是人们无法理解的，除非使用旧的概念去说明这些新力量，而且，哪怕仅仅是为了对比，也需要借助于旧的概念。同时，从任何角度来看，新的力量也可能是无法预测的。这种无法预测不应该让我们惧怕去了解它们，反而应该促使我们主动地去寻找答案，因为假如要对我们的城市进行重新规划，我们必须知道哪些部分在变，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变。

商贸和交流是城市形成的原因。城市从来都是出现在自然形成的商贸路线的交叉点上，而且都是当时的战略要地：克诺索斯，位于爱琴海上的十字路口；摩亨约-达罗（Mohenjo-daro）^①，位于古印度河谷；巴比伦和巴格达；布哈拉和基辅；开罗、雅典、罗马、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朱诺——这些地方或是位于河边、河口、海岸，或是位于山谷间商路的要冲，抑或是位于丝绸之路、铁路沿途，它们都是天然的运输集散地。与之类似，在一些较小的城市里，当地的市场也是出现在城里的十字路口处，在土地肥沃、盛产农作物的地方，在水流驱动的磨坊附近。

这里出现的思想交流和商品交流是同等重要的。在城市里，只有当思想的碰撞增加了才智，富余的财富催生了享乐，金钱的力量带来了安全感，才会出现进步和文明。从一开始，城市的出现就证明了这一点：

城市中的社会进步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相比以往，更多的人住在村寨里，他们彼此之间紧密接触，而城市则是社会交往中的一个大漩涡。器物 and 商品从不同的角落集中到了一起，并且各种东西重新组合；陌生人不仅仅带来了陌生国度的物件，而且也带来

① 摩亨约-达罗（公元前2600年—前1800年），又称“死丘”或“死亡之丘”（Mound of the Dead），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重要城市，大约于公元前2600年建成，位于今天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拉尔卡纳县南部。——译者

了新的信息，以及前所未见的信仰；老朋友们也在这里聚会，谈论他们各自听说的新闻和旧闻。在大量物质财富面前的这种不停的碰撞激励了人们去创造更多财富，获得财富，并守住这些财富；有了这些财富，人们才有能力进行各种投资计划，而不仅仅是单纯地继续获取物质财富。因此，城市就成为推动经济进步、社会分工、艺术创作、思想理论创新等各项活动的中心，根植于这些新发展而出现的全新的社会关系也逐步发展成一套全新的政治和经济机制及道德判断标准。¹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从人类所知的最早的城市开始就有了所谓的城市规划，如印度河谷流域的那些城市、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谷的那些城市。这些远古时代的城市一定都是有规划的，因为所谓的城市规划不过是社会对土地使用进行控制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在一个人口众多、居住集中的区域里，为了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必然要对这样的区域进行规划。对于游牧部落来说规划是不必要的，因为陆地草原足够辽阔，他们可以随处支起帐篷。他们不断地寻找牧场草场，而一旦发现了草场便征服夺取，于是形成了一种完全属于“实用型”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然而这样的形式与城市没有关系，也不讲究行为举止规范。这些在平原上游荡的部落尽管后来也征服过迈锡尼、罗马和基辅，但是他们对关于未来的认识之类的哲学思考不屑一顾，觉得毫无用处。他们想得到什么就会去抢，然后移到下一个目标。已经得到的东西他们就予以保留，保留不住的也就消失了。与之相对应的是耕田种地的小农文化，农民稀疏地分布在大地的表面，他们站在地上，望着天，然后再紧盯着自己的土地，根本不会去关注未来，他们关心的就是脚下的土地和四季的更迭，他们只是期盼着没有人来打扰自己平静的生活，他们辛苦劳作已经精疲力竭，根本没有意愿去考虑把其他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但是城市居民则不同。正如特纳博士指出的那样，与牧民和农民相比，城市居民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们有盈余。为了获取盈余，就需要对未来有预判。在众人都追逐盈余的情形下，而且这些人和自己既没有血缘关系，也不属于同一个部族，这时要想获得盈余就必须事先建立起规则，用这些规则来约束竞争者，也约束自己。这就是社会管理、法制建设的起点，它建立起的秩序完全不同于部落里的军队式管理模式。当一个村落演变为城市的时候，它的范围会由一个边界加以明确界定，这是因为城市必须防止强盗团伙的掠夺袭击，而城里每个居民的居住空间必须加以规范，甚至要比尼罗河谷那些拥挤的农民居住地还要紧凑。每一位城市居民都需要自由地进出自己的居所，去市场商业区，进出城门，更重要的是去水井取水，这些行为都必须得到充分的保证。因此，城市道路和公共广场就不能任由个人随意加以侵占，这些地方为公众所有，也为公众所用。

1 《伟大的文化传统》（*The Great Cultural Traditions*），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地区城市文化的兴起（*Rise of Urban Culture in Mesopotamia and India*）。拉尔夫·特纳博士（Dr. Ralph Turner），麦格劳希尔集团（McGraw-Hill），1941 年。



摩亨约-达罗城，DK 地区（C 区），北半部，晚期平面图，1930—1931 年。

这就要求有组织、有管理。在不少古代城市里，组织和管理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比如在印度河谷的摩亨约-达罗城，它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3000 年。这座城不仅有规则的道路系统，而且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士所居住的寓所的高度也不同，而住宅的高度决定了道路的宽度。这样，一种根据氏族阶层建立的规划体系就形成了。这种体系实际上和今天的规划分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穷人住在这个区，中产阶级住在那个区，富人区则是在别的地方，至于黑人和墨西哥人，根本没有地方给他们。摩亨约-达罗城还有地下污水排放系统，这是已知最古老的污水排放系统。这个系统把每一个寓所的卫生间污水汇集起来，然后排放出去。这个城里的每一栋住宅都有自己的卫生间，连接这些卫生间的斜槽都藏在墙体里，它的系统设计和中世纪城堡里的排水系统差不多。对于印度河谷里的这座古老城市，我们知之甚少²，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座城市有着高度组织的社会和卫生设施。最让人惊奇的是，这里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宗教的痕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庙宇或教堂，这一点目前还无法解释。这

2 印度河谷流域河床文化，其中的摩亨约-达罗城和哈拉帕（Harappa）是（现存的）最杰出的实例。这个文化显然应该与尼罗河谷文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处于相同的地位。考古挖掘工作（这项工作因为战争的阴云而中断）在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及其继任者的指导下终于完成，结果也已经完整、详细、简练地发表出来（《摩亨约-达罗城和印度河谷文明》[*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约翰·马歇尔爵士主编，伦敦亚瑟·普罗赛因书局，1931 年；欧内斯特·麦凯 [Ernest J. Mackay] 在印度德里发表的著作，1937—1938）。

座城市也没有有组织的防御设施，也就是说它没有城墙。这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些缺少这些明显特征的城池。它们是商贸城市，如同柬埔寨著名的吴哥古城一样，因为气候的改变、河水的干涸，都消失了。

我们知道，其他的古城也是非常组织有序的。迦勒底的吾珥城（Ur of the Chaldees）是圣经里亚伯拉罕时期的古城，大约有 25 万居民。阿玛纳（Tel-el-Amarna）和巴比伦都是有多条街道的大城市，都需要有精心规划的市区组织秩序和有效的政治管控，这样才适合人们居住。

城市的规划布局会持续很久。城市的道路系统和公共空间一旦确定，余下的用地就会被分割成许多小块，为私人业主所拥有。除非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或者社会革命，不然这样的布局就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即便是发生了这样的灾害或者革命，城市布局也很少发生巨大的改变。这种稳定性可以追溯到摩亨约·达罗城出现之前，这座城市的道路系统实际上因为洪水的毁坏曾经经历过三次重建，但其布局依旧保持不变。这样的稳定性源于与土地所有权息息相关的处于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思想。建筑可能因为过时而变得可有可无，也可能被拆除，或者自己坍塌，但是建筑物下面的土地是不变的。在大马士革仍然保留着“一条名叫直街的大街”，尽管恺撒皇帝的宫殿早已不复存在，但是游客们仍然会说“这条马路恺撒当年曾经走过”。³

如此说来，除了表面上的一些东西之外，时间并不会改变城市中的任何东西，自然灾害也不会将城市改变太多。罗马曾经被大火烧毁，伦敦也是一样，巴尔的摩和旧金山也都如此。私有土地那不变的布局让尼禄这样有权势的君主都感到力不从心，对于权势不及尼禄的政府来说就更加无能为力了。改变人们生活环境的最大的力量来自于革命，但这种革命行动并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和技术的革命，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调整和战术层面的转变。即便是这类革命性的改变也大多发生在新城市里，而这些新城市都是革命成功后的必然产物。旧城市只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局部添加一些新的布局要素，旧有的城市结构不可能被彻底清除。直到拿破仑三世时，巴黎仍然保持着中世纪的布局，只有在帕西（Passy）那样的新区布局才有所改变；而事实上早在卢泰西亚（Lutetia）时期之前就出现的高卢岔路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只是道路的中线多少有些偏离最初的位置。欧洲的每一座大城市，从中世纪到现在都呈现不变的格局。而那里许许多多规模稍小的城市，它们从罗马人统治时代开始，或者从中世纪形成以来，基本上没有改变，即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

在从公元前 3000 年到 17 世纪末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无论是城市规划实践本身，还是在对城市规划产生过深刻影响的领域里，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进步值得一提。这一事实很有意思。

美索不达米亚的地面排水沟和半地下污水排放系统与中世纪城市里的那些系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

3 关于城市规划总图持久性的有趣讨论，可参见皮埃尔·拉夫丹（Pierre Lavedan）的《城市建筑历史导引》（*Introduction à une histoire de l'architecture urbaine*）中的一节“规划的持久性定律”（*la loi de persistance du plan*）。

不同，甚至和 19 世纪的城市污水系统也差不多；首都华盛顿特区在 1860 年之前就一直采用地面明沟排水；摩亨约-达罗城里的地下排水系统实际上和古罗马的地下排水系统是一样的，只是比它规模小一点而已；而古罗马的地下排水系统和巴黎的地下排水系统基本上相同。雨果的小说让巴黎的地下排水系统成为不朽的传奇。特洛伊的城墙与维罗纳城墙的区别好比海伦和朱丽叶之间的差异。巴比伦城里的街道和新阿姆斯特丹（即今天的纽约）的街道都是泥泞的土路面，到处可见在垃圾中寻找食物的猪，道路两旁都是一些拥挤不堪的砖房子，里面采暖极差，通风糟糕。输水渠或许有一段时间是新的，但是没人敢确定它曾经是新的，因为那是从附近灌溉河沟发展而来的。即便是这样，很少有城市是靠输水渠供水的。取水大多是通过水井，从圣经故事里彼土利（Bethuel）女儿利百加（Rebecca）的时代起到《名利场》（*Vanity Fair*）里瑞贝卡·夏普（Rebecca Sharp）的时代都是如此。

事实上，直到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革命性的改变只发生过两次，而且这两次改变因为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城市，效果也有所不同。第一次是炸药的发明，在这一发明面前，城墙轰然倒下；第二次是封建主义向重商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使得教会的程序仪式被法庭的程序所取代，从注重天国变为注重现实。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着新的改变，它让我们从地上又回到了天上，但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它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变迁。汽车的发明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在二维世界里的机动性，而飞机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维度。第一个转变只是在我们熟悉的进步中增加了一定的量而已，而第二个转变则是全新的，是一场革命性的改变，不仅在物质实体、经济体制上有所改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改变。飞行后返回地面的人所体验到的欣喜是其他人所无法了解的，听过漆黑的太空中那精彩韵律的人也不再可能是以前的那个自己。我们已经踏上了征服三维空间的征程，我们也清楚地了解了与第四维度的关系，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征服时间。

古代所有的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墙作为防御手段⁴。但城墙的长短和高矮则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城市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程度，以及城市的财力状况，同时建筑材料也因为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有的是土坯，有的是砖，有的是漂亮的石头，而有些只有栅栏。在山地城镇里，山头总是最强有力的要塞，是最神圣的地点。神职领袖和世俗官员占据那里，而平民百姓则围绕在四周加强守卫。如果城市变得强大，那么城墙也就随之扩大，雅典、罗马、托里多（Toledo）就是这样的例子。

雅典卫城曾经是一座军事堡垒，后来成为雅典娜的宫殿，成为忒修斯（Theseus）的家，成为司法的法院。卫城的山脚下住着民众，外面有城墙保护，再往外是广阔的田野和橄榄园，艾留西斯（Eleusis）和大海就在不远处。水路上运来的货物要比陆路多得多：从克里米亚运来的麦子、从特洛伊带来的歌声，以及从埃及带来的知识。在城墙外面还有柏拉图的学院，充满哲思的话语在那里诞生。罗马城坐落于罗马七丘之上，也有城墙围护，佃户、农户及卫队守军住在城墙外。罗马人是一帮喜欢城市生活的人，

4 如上所述，印度河流域的城市看起来是一个例外。